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历史文化

研究报告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课题组

2023年8月

目 录

前 言.....	1
一、成都红牌楼历史文化溯源.....	1
(一) 红牌楼的得名.....	2
(二) 红牌楼的历史变迁.....	2
(三) 红牌楼的历史文化底蕴.....	4
二、传承发展红牌楼历史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7
(一) 有利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7
(二) 有利于提升区域文化品质.....	9
(三) 有利于推进产业项目建设.....	11
三、传承发展红牌楼历史文化的时代机遇.....	13
(一) 发展设想的坚定引领.....	13
(二) 历史文化的深厚支撑.....	14
(三) 其他地区的经验借鉴.....	15
(四) 文化项目的有力支持.....	17

前 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历史和地方是相互依存的一对关系，历史由地方创造，地方因历史而传承。如果历史退场，所谓地方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没有地方，历史将失去支撑、失去活力。因此，地方发展需要不断回望历史，把握地方的历史发展规律，深刻理解地方的历史方位，将历史智慧、历史文化融入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武侯区是成都老五区之一，所辖区域古为蜀国地域，因区内著名的武侯祠而得名。“万里南丝路、千年蜀汉城、百年华西坝、诗竹望江楼”赋予武侯区独特的文化印记，是武侯区传统与现代相互融合、悠久文脉与鲜活创意交相辉映的重要实践，成为武侯区代表性文化地标和文化品牌。实际上，武侯区的红牌楼历史文化同样具有深厚历史积淀，传承发展红牌楼历史文化能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赋能，研究报告以此为切入点，着力探索红牌楼历史文化渊源，揭示传承发展红牌楼历史文化的价值、意义和时代机遇。需要说明的是，报告中的红牌楼区域并不局限于当前行政区划上的红牌楼街道，而是“历史的红牌楼”和“现在的红牌楼”的叠加。

一、成都红牌楼历史文化溯源

红牌楼曾是成都地区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其历史渊源有自。它地处古代南方丝路、茶马古道要冲，见证了成都自明

代以来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全过程。今牌楼已不存，渐成为一个区域的代称。在这个区域内，有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也饱含了成都许多的文化记忆。

（一）红牌楼的得名

红牌楼在古代位于成都城南郊位置，《华阳县志》云：“红牌楼堡距县南十里。”红牌楼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约1543年前后），由于当时经过成都前往京师朝贡的藏族使团日益增多，来往频繁，为迎接进入成都的高僧、喇嘛及商人的到来，明蜀王朱椿便在城南十里修建了两座三门式牌坊，并按照藏区风俗，涂为红色。由于北方人习惯将“牌坊”称为“牌楼”，蜀王府中这样称呼，故时人也称之为“红牌楼”，沿用至今。因牌坊上题有“度人”二字，故又名“度人坊”。

（二）红牌楼的历史变迁

红牌楼的修建与其所处的位置及当时的文化交流有一定关系。红牌楼区域在成都城南门外。此门是成都通往藏区的必经之处。汉代至唐宋时期，南方丝路与茶马古道的出发点。元朝崇信佛教，以藏族佛教领袖为“国师”。元统一全国后，大批藏族僧侣和官员通过成都来到内地，他们将元朝统治者的大量赏赐和自己采购的货物，利用驿道运往藏区。由于元朝驿路畅通，使者供应食宿和交通工具，故朝贡人员络绎不绝，流量渐大。到了明朝，西僧入贡的使团规模更加庞大。而且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朝廷规定乌斯藏遣使只能通过四川路进入内地，“多不过百五十人。由四川路入”。这使得成都南门成为联

系汉藏民族交流的最重要关卡。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明嘉靖年间，时为蜀藩王的朱椿便在城南十里处的红牌楼场镇南北街头各修建了两座牌坊，以迎接藏区前来送贡礼、做生意的藏族同胞。牌坊设三道龙门，门柱雕有龙凤图案，中间大门通车辆，两边过行人。进了牌楼，两旁皆为红色街面，场中又有一过街红楼，场尾（南街头）有红恩祠，祠内亦有一排红楼，真可谓街头红牌坊，通街红楼宇，故红牌坊亦被称为红牌楼。

红牌楼是城南区域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受到破坏被毁，但遗迹尚存。随着该区域贸易的繁荣，渐渐发展为一个场镇。从清代开始，正月初一这天，成都人纷纷涌向南门的武侯祠，游“喜神方”，摸喜神、沾喜气。历史上，正因为成都的南门是生门，是喜神方，过去将士出征和凯旋归来，都要经过红牌楼进出，在明朝中央平叛地方叛乱的过程中，霍去病后人曾在此建得胜牌坊迎接凯旋之师，因此，红牌楼又名得胜牌坊。出门经商和外地来成都的商人，也期讨个好彩头，进出都要借道南门。成都南门的武侯祠（喜神方）和红牌楼（生门，属土，五行里，又有土生金的说法）地区历来都是游人如织、商贾如云。红牌楼这样城南就逐渐发展成了成都的交通枢纽和物资运输集散地，诞生了繁盛一时的“南市”，人口的增长，人才的到来，为后来成都“南市”兴盛奠定了格局。

民国时期，红牌楼以筑路被毁。当时本地士绅上报官府，建议将该区域改为永丰场。1912年，红牌楼区域改名为永丰场，

之后红牌楼与永丰场两种称谓并行，代指成都城南郊区域。

（三）红牌楼的历史文化底蕴

红牌楼区域为出入成都的重要通道，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and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具有很好的文态、业态发展基础。

1. 南方丝路、茶马古道的要冲

汉代开始，成都已是著名的丝绸生产地，成都丝绸连同其他蜀地特产通过民间商人，从成都出红牌楼至临邛，南下永昌，经畹町出国境，贩运至掸国（缅甸）、身毒（印度）等国，这条从成都出发到印度的道路，史称“蜀身毒道”。成都与藏区自古相邻，两地文化交流频繁。贡赐贸易的互补性经济催生了唐朝与吐蕃的“绢马互市”。之后各朝发展茶马贸易，由于兼具“贡道”与“商道”身份，川藏道成为两地往来与跨文化传播的主要通道。

2. 三国蜀汉文化的核心

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也将其府邸、桑园和读书台建在红牌楼区域。《华阳国志》云：“（诸葛）亮乃约官职，修法制，筑高台于成都之南，以延四方之士。”此台就是所谓的诸葛亮读书台，宋代时遗迹尚存。明代天启年编撰的《四川成都府志》和《宣统成都通览》中也都记载了“孔明读书台”在城南。

《太平寰宇记》载：“读书台在（成都）县南，诸葛亮相蜀，筑台以集诸儒，兼以待四方贤士，号曰读书台。”宋代的宋京在《孔明读书台》写道：“君不见孔明书台遗庙旁古书不见台荒凉。卧龙未起蜀天远，茅庐日日空南阳。赤符光寒白水秣陵

王气犹能作。璋若婴儿操虎狼，脱去荆州殊不恶。十倍奇才安用书，此台昔时知有无。蜀人思君识古处，未若江水存兵图。黄冠所居门第改，祇有坊名今尚在。安得台边见古人，秋草重生类书带”。宋人魏了翁《成都府朝真观记》称：“观西偏为诸葛忠武侯祠与读书台。故老相传为武侯故宅。天宝五年，章公琼始更为观，奉命乘烟。乘烟云者，谓侯女于此乎轻举也。观尝废于庆历，复兴于文忠烈公镇蜀之日。重和元年始易乘烟为朝真。”另据民国《华阳县志》载：“杜光庭《录异记》：成都书台坊武侯宅南乘烟观内，惟废何时已不可考。”南门之外皆城南，也就是永丰场区域，诸葛亮读书台即在红牌楼区域范围内。

3. 民族文化交流的重镇

汉藏交流由来已久，以文成公主入藏为标志，拉开了汉藏文化交流的序幕。以红牌楼的建成为标志，成都成为汉藏民族之间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枢纽。经由成都的汉藏贸易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影响日益深远。藏族在成都的商贸文化交易活动十分活跃，交易物品名目繁多，特色鲜明。何宇度在其《益部谈资》中记载：“西番与蜀相近，贡道必由锦城。有三岁一至者，有一岁一至者。其贡则小镀金铜佛、铜小宝塔、彩色小画佛，铜铁刀剑、盔甲，及珊瑚、唵叭香、舍利子、氍毹诸货也。舍利子，止小菜豆大，红紫色，用香锦包裹”。其三，汉藏货物交往，唯凭粗细颜色定价。“番物名不一，志载惟足力麻、铁力麻、氍毹三种。而自蜀人言者，有曰：细毯、工布、氍毹绒、边工毯、姜纳、大货、贴里绵，唯凭粗细颜色定价”。

清代成都商业发展，民族交流活动也更为密集，除官方朝贡与贸易活动之外，民间商贸活动也成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杨燮的《锦城竹枝词》称：“大小金川前后藏，每年冬进省城来。酥油卖了铜钱在，独买饶钲响器回。”其中所描绘的贸易场景，说明当时藏区与成都两地商贸交流已很频繁。清末在皇城南门外有巴塘人定居的地点，这说明清末民初成都与藏区的跨文化交流活动已颇具规模，红牌楼成为民族文化交流的重镇。

民国时期，当时的政府在康藏地区设治直接推动商贸与人员往来，藏区与成都的跨文化交流进程得到更进一步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藏解放与川藏公路通车进一步推动两地交流进程。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引来大量藏族移民在成都发展，成为跨文化传播交流的主力。几十年来，成都武侯区民族街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内地规模最大的藏族社区与藏族文化产品集散地。在此生活的藏族移民抓住政策与时代机遇，积极发展民族产业，拓展汉藏文化交流路径，将跨文化交流进程推向新的高度。

4. 忠义爱国文化的摇篮

红牌楼这片热土有着丰富的忠义文化的血脉传承，在近代历史中更是伴随着抗日战争的特定历史背景，孕育出四川地区特有的“袍哥”文化，并凝聚了川军将士波澜壮阔的抗战爱国主义精神。清代末年，红牌楼即为抗清基地之一。成都附近十几个州县的同志军，以农民为主体，曾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

红牌楼和犀浦等地同清军激战。各州县同志军呼百应，把守关隘，截阻文报，攻占县城。新津县哥老会首领侯宝斋率领所部同志军与双流县同盟会员向迪璋部会合，赶至成都南郊，在红牌楼和清军激战，并乘胜进抵成都城下。1912年6月16日，四川西征先锋队朱登五率部出发，军政警商各界及各学校学生代表执欢送旗帜从南门大街起直至武侯祠、红牌楼外欢送。

抗战时期，李家钰率部出川抗战。他在山西前线曾与八路军并肩御敌，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4年殉国，时年53岁。魂归故里，葬于南郊红牌楼广福桥边。四川省人民政府于1984年5月21日追认为抗日英勇献身的李家钰为革命烈士。2014年，李家钰将军被民政部公布为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著名抗日英烈。

二、传承发展红牌楼历史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红牌楼文化具有悠久历史，并呈现多维度特点，当下却出现物质载体缺失，文化梳理不全面，文化传承发展欠缺的局面。随着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彰显日益重要的价值，结合武侯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传承发展红牌楼历史文化具有当代价值和意义。

（一）有利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不断深化对文化

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创造性将文化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自信”，加快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打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崭新局面，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巴蜀文化，发展天府文化是在新时代担负新的文化使命，推动文化繁荣，助力文化强国建设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实践。在经济发展实践中，文化是符号化、具象化的，也是可感知、可传播的，其本质在于要推动文化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融进大众日常生活，通过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彰显价值。

红牌楼作为历史建筑，见证过地方历史变迁，承载厚重历史文化，连接大众文化记忆。从《华阳县志》记载明蜀王建坊以来，已有400余年历史，区域因坊得名，在一定程度上红牌楼是古今文化传承发展的“连接器”，它以符号化的形式串联古今。然而，目前对红牌楼历史文化的梳理、传承、利用都较为薄弱，主要表现在：一是缺乏“红牌楼”的物质载体，客观

上造成文化抽象化，不利于传承和传播；二是缺乏对“红牌楼”历史文化的系统梳理，没有充分彰显区域文化厚重感，传承发展的内涵支撑不足。因此，从载体再建和内容梳理两个方面着手，可以唤醒历史文化记忆，为红牌楼历史文化传承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为文化的转化和创新提供空间载体和文化元素。

（二）有利于提升区域文化品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随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文化赋能作用更加重要，区域竞争中文化价值全面彰显。2019年，四川省印发《建设文化强省中长期规划纲要（2019—2025年）》，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文化强省，而“强”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主流思想引领力显著增强，巴蜀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文艺精品创造力显著增强，文化服务供给力显著增强，文化产业竞争力显著增强，文化发展保障力显著增强。关于巴蜀文化影响力方面，《纲要》明确了要求：巴蜀文脉传承有序、影响广泛，“天府四川”形象标识鲜明，巴蜀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独特魅力更加彰显。2019年，中共成都市委印发《关于弘扬中华文明发展天府文化 加快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决定》，坚持以文化为城市发展的强劲动力，按照“文化，是成都最厚重的城市底色、最骄傲的人文荣光”的思路，以“三

城三都”为支撑全面开启世界文化名城建设，并提炼了天府文化“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核心内涵。进入“十四五”期间，无论是《四川省“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四川省“十四五”文化发展和改革规划》《四川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四川省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规划（2023-2035年）》，还是《成都市“十四五”世界文创名城建设规划》《成都市“十四五”文化广电旅游发展规划》《成都市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等都强调文化对提升区域文化品质和增强文化竞争力的重要价值。2020年，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城市有机更新实施办法》将“文化传承全面提升”纳入城市有机更新要求，明确指出：“在挖掘和传承城市文脉的基础上，着力培育特色文态。”“对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历史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进行全方位保护，在城市有机更新中融入现代城市发展理念，推动历史文化保护与文化、旅游、体育、商业等行业融合发展，鼓励、支持对保护保留建筑进行活化利用。”2021年，武侯区首次公布了人民南路片区、武侯祠红牌楼片区、武侯新城环城生态北片区以及她妆小镇环城生态南片区等“四大城市有机更新项目”。从武侯区推出的重点案例——华西坝城市更新项目的建设思路来看，项目着力彰显百年华西底蕴，坚持保护利用+场景营造，打造华西坝历史文化风貌区、人民南路人文景观轴、锦江生态休闲廊、六路文化展示脉络等文化场景，构建特色风貌区和人文活力区。文化是城市更

新的品质保障。

武侯区因武侯祠而知名，红牌楼街道源于对“红牌楼”文化的接续。红牌楼 400 多年的历史传承，已深深植入市民文化记忆，并唤起市民和游客的文化期待。位于红牌楼二环路高架上的红牌坊之所以成为大众识别现在红牌楼片区的标志，就是对记忆的传承、期待的满足。但这种简约化的红牌坊标识，并不能充分彰显红牌楼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需要在挖掘和传承文脉的基础上，将“红牌楼”文化植入到街区、文化场馆等公共空间，培育“红牌楼”特色文态，重塑特色文化地标。同时，可以强化红牌楼历史文化的要素提取、创意转化，以此来打造城市文化品牌，提升区域文化品质和识别度，持续扩大红牌楼历史文化影响，为“国际商务高地，人文宜居武侯”增光添彩。

（三）有利于推进产业项目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篇章特别指出，要“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重大文化产业项目是发展的源头活水，是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内容，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抓手。红牌楼片区是三国创意设计产业功能区的重要支撑，三国创意设计产业功能区作为全市 58 个功能区之一，重点围绕三国文化打造文创产业发展高地。经过持续有力推进，功能区已经取得了重要成绩，2020 年功能区实现文创产业增加值 38.25 亿元，占全区文创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 31.7%。但仍然存在文化挖掘利用不够、

主导产业实力不强、空间载体支撑有限、城市形态不优等短板，需要进一步提升优化。三国蜀汉城是功能区的重大项目，2023年，成都市印发了《高质量打造全省文旅经济发展核心区推动世界文化名城建设行动方案》，三国蜀汉城项目被列入重大文旅项目清单，属于“天府文化守正创新创意转化行动”项目类别。按照规划，三国蜀汉城以武侯祠为中心的红牌楼、双楠、浆洗街、玉林片区将是核心发展区，其中红牌楼片区重点建设文化商贸区，红牌楼、双楠片区重点建设文化居住区。因此，红牌楼片区是三国蜀汉城项目的核心发展区，也是三国创意设计产业功能区的重要承载区。

三国文化是功能区和三国蜀汉城项目的文化核心，但并非只传承发展三国文化，而是以三国文化为牵引，讲好区域整体文化传承发展故事。随着四川省“文艺两新”人才创新与产业发展孵化园项目在红牌楼片区布局，文艺新组织和新群体将在此集聚，红牌楼片区将吹起“文艺风”。这恰好回应了《三国文化创意设计产业功能区“十四五”规划》倡导的“1+3+3”文创产业体系：以文化创意为核心，发展创意设计、创意文旅、创意视听三大主导产业，无界商业（文创+商业）、高端商务（文创+商务）、服务贸易（文创+贸易）三大融合产业。未来红牌楼片区将在文化创意、创意旅游、无界商业等产业领域呈现良好发展态势，推动功能区规划落地落实。红牌楼文化在历史传承层面是三国文化的延续；在民族融合层面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表现；在商业贸易层面是商贸繁荣的历史

象征……结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创新拓展红牌楼历史文化维度，推动红牌楼历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以为产业发展赋能。

三、传承发展红牌楼历史文化的时代机遇

当前，传承发展红牌楼历史文化迎来了良好机遇，它适应新时代文化发展要求，源于区域品质提升的需要，基于深厚历史文化的支撑，鉴于兄弟省市的成功经验，并已经项目落地支持。

（一）发展设想的坚定引领

红牌楼片区经过“红牌楼”到“永丰场”再到“红牌楼”的历史过程，产业上历经沉浮，城市建设也需要转型。目前，政府和企业提出将红牌楼区域打造成文化特色鲜明的文化新地标“红牌里”的设想，与成都市已有的锦里、太古里、文殊里一起形成“四里”，有望成为文脉传承、文化展示、文旅融合和文艺惠民的四大黄金打卡地。锦里，以明末清初川西民居作外衣，三国文化与成都民俗作内涵，集旅游购物、休闲娱乐为一体；太古里，毗邻历史悠久的大慈寺，接壤人潮涌动的春熙路商业区；文殊里，紧邻知名文旅地标，集禅林圣迹打卡、网红主题餐饮于一体；红牌里，位于明嘉靖中蜀王建坊的红牌楼片区，该地曾是民族和睦、商贸繁荣的有力象征。按照该发展设想，红牌里必须遵循传统文化与现代生产、生活、生态的融合规律，通过对接区域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城市更新，逐步形成更好的发展格局。在发展设想的引领下，对红牌楼历史文

化的传承发展必然全面深化，推动红牌楼历史文化的学术研究、展示展览、要素提取、文化创意、品牌塑造、产业培育等环节。

（二）历史文化的深厚支撑

红牌楼历史文化呈现多维度特征，有建筑艺术的表现、历史文化的延续、民俗文化的浸染等等，红牌楼作为核心文化符号贯穿其中。因此，红牌楼历史文化应该是广义上的概念，并不单指“红牌楼”本身，而是指向以“红牌楼”文化为核心，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形成的区域文化体系。往前追溯，可以连接红牌楼片区的丝绸之路文化、三国文化等；往后延伸，可以连接红牌楼片区的商贸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红色文化、经济文化等。红牌楼片区，既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又是川藏公路的起点和汉藏交流融合的历史见证。牌坊作为红牌楼场镇的标志性建筑和民族和睦、商贸繁荣的象征，雄踞街头，壮观达远，逐渐聚合形成了一处集市。清代诗人李调元的诗《红牌楼》描摹了红牌楼热闹繁华的景象：“山色春光处处迷，新莺唤我过桥西。柳经霜后绿初染，草带烧痕青未齐。烟簇红楼堪系马，日斜白屋欲啼鸡。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众跻。”民国初年，本地士绅为祝愿五谷丰登，上报官府批准，于1913年将红牌楼改名为永丰场，传统的红牌楼和永丰场地名长期并行使用。1940年，设立永丰乡。1950年，老川藏路开始修建，这条路经成都、雅安、甘孜、道孚、德格入藏。红牌楼路口作为老川藏路的起始点，每天车辆众多，成为当时成都进藏，乃至通往云南、东南亚、南亚的必经之路之一。

1958年，红牌楼片区为永丰人民公社，1984年，更名为永丰乡人民政府。20世纪80年代，永丰乡乘改革开放之机，发展农业和乡镇企业，80年代中期成为全省有名的亿元乡之一。1990年，永丰乡入选全国乡镇企业百颗星乡镇，1993年，永丰乡入选全国乡镇企业三百强乡镇，展示出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1994年，西部汽车城正式开业，此后的30多年，这里一直是西部地区汽车汽配贸易的主要市场，“北有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西有红牌楼西部汽车城”声名远播。2004年，撤销永丰乡，成立红牌楼街道，武侯区启动了以红牌楼街道为中心的红牌楼商圈建设，在红牌楼场镇旧址上兴建成现代化的红牌楼商业广场，开启了新的发展征程。从历史来看，红牌楼片区在不同的阶段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这里是目睹了蜀地与康藏结下深厚情缘的地方，是抓住一切机会发展变革的地方，也是沉淀着成都多元开放、兼容并蓄精神的地方，承载着历史的厚度和文化的深度，为当代的传承发展积淀了深厚文化基础。

（三）其他地区的经验借鉴

根据历史文化真实，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复建古建筑，是文化传承发展的措施之一。比如蜀州牌楼，就是后来复建的牌楼，位于成都市崇州市光华大道与唐安东路的交汇点，牌楼高16.76米，宽31.7米，牌坊上，“蜀州”二字格外醒目，两旁写着著名诗人陆游脍炙人口的诗句“江湖四十余年梦，岂信人间有蜀州”，彰显出崇州厚重的历史文化。潮州古城的牌坊街，现有二十多座石牌坊，多数都是本世纪初重新修建的。而

据史籍记载，这里曾经有三十九座明清时代的牌坊，但多数在20世纪50年代被拆除。本世纪初，根据历史资料，复建牌坊群的时候，尽量做到了原址原貌，彰显地方文化厚重历史。一句民谣“前门楼子九丈九，四门三桥五牌楼”道出了前门、五牌楼等建筑在北京人心中的地标性地位。前门五牌楼始建于明代正统年间，位于中轴线上的正阳门桥南，是一座五间、六柱、五楼的冲天式建筑样式，故被称为“五牌楼”，高14米、宽45米。如今的五牌楼复建于2008年初，2022年8月，又启动了对其进行油饰彩绘翻新，与周边风貌相融。因此，复建红牌楼有其他地区的经验借鉴，重点是要做好历史资料的梳理、研究，尽量符合历史面貌，做到以物质载体传承发展红牌楼历史文化。成都宽窄巷子历史街区改造，以原真性为保护理念，采取街巷—院落—建筑—装饰四位一体的整体保护方式，彰显成都“两江环抱，三城相重”的城市格局，两千年少城文化和三百年满城文化的传承，北方胡同与川西民居的结合，成都平原的市井生活特征。宽窄巷子成为历史街区改造的经典案例，同时也是重要的文化消费场景和城市名片，带动了宜宾“宽窄巷子”、宜昌“宽窄巷子”、东北“宽窄巷子”等。根据青羊区文体旅局的数据，2023年“五一”假期宽窄巷子接待游客89.91万人次，其中假期第二天就接待游客高达20.8万人，同比增长311.2%，单日游客量和最高峰值创新历史新高，展现出巨大的品牌引领力、游客吸引力、消费吸附力。

（四）文化项目的有力支持

除了三国蜀汉城、城市更新等项目的持续推进，现阶段直接推动红牌楼历史文化遗产发展的项目是四川省“文艺两新”人才创新与产业发展孵化园。近年来，中国文联党组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先后出台系列文件和多次开会部署，并将“文艺两新”内容列为全国文联“十四五”期间改革发展重点工作。在四川省委专业研究和工作部署后，四川“文艺两新”工作成为中国文联关注的重点之一。四川省文联提出规划和创建园区设想，中国文联对此高度重视，寄予厚望，希望四川在全国率先探索出新经验。项目建设工作得到了省委书记王晓晖的认可，作出肯定性批示；省文联党组书记邹瑾、成都市委副书记陈彦夫、市委宣传部长辜学斌、武侯区委书记许兴国、区长景波等领导高度重视，并协同研究推动项目落地。目前，孵化园已形成了省市区的互动机制，党政导向、文联引导、业主投入协同推进园区加快建成。通过园区建设，红牌楼片区在注入“文艺两新”力量后，将呈现文化主线突出，文化产业全面赋能的良好态势，“文艺两新”服务示范、历史文化遗产博览、文艺科创产业孵化、时尚潮流打卡之地和市井文化烟火地气将加快呈现，城市功能布局将进一步优化、地区综合承载能力将全面提升、巴蜀历史文脉传承与新时代文化建设将深度融合。按照项目规划，将共建牌楼与文化街区，基于政府建设基础，一些企业和社团组织愿意参与到项目建设中。并已有十多

家企业和社团志愿捐建中心城市博物馆群，其中国际能投已捐赠一万块汉砖指定在该地建设博物馆群使用，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生动要素材料。随着相关项目建设的深入推进，文化人才的加快集聚，文化遗产必将全面深化，文化创新创造也将进入新阶段，红牌楼历史文化遗产发展有了强有力的保障。

课题组负责人：

黄俊棚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研究员

课题组成员：

邱明丰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所长、研究员

彭东焕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税显辉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硕士研究生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23年8月15日



(联系人：黄俊棚，电话：13088008300)